

2018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对外开放丛书
张燕生 主编

中国对外开放 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赵忠秀 等著

非
外
借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8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对外开放丛书
张燕生 主编

中国对外开放 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赵忠秀 等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对外开放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赵忠秀等著.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9. 4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对外开放)

ISBN 978 - 7 - 5454 - 6703 - 1

I. ①构… II. ①隆… III. ①对外开放 - 研究 - 中国②世界经济 - 研究 IV. ①F125②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73560 号

出版人: 李 鹏

责任编辑: 陈 潜

责任技编: 许伟斌

中国对外开放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Zhongguo Duiwai Kaifang Yu Quanqiu Jiazhilian Shengji

出版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12 楼)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广东鹏腾宇文化创新有限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科技九路 88 号七号厂房)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
字数	330 000 字
版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 - 7 - 5454 - 6703 - 1
定价	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发行部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 (020) 37601950 邮政编码: 510075

邮购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 (020) 37601980 营销网址: <http://www.gebook.com>

广东经济出版社新浪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gebook>

广东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胡志海律师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 言

改革开放 40 年来，随着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分工由传统的产业间分工转变为产业内分工，生产工序不断细化，生产链条逐渐拉长，产品生产跨越多个国界的现象愈来愈普遍。另一方面，信息通信技术的革新，信息沟通成本的减少，在微观上使得生产过程的组织也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使得信息在跨境的协调生产过程中成本更低、更加便捷，原先必须在近距离协调的生产各阶段能够分散到不同的地理空间进行（Baldwin 2006, 2011, 2013），大大地推动了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 GVCs）的形成。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路径是嵌入全球价值链。充分利用成本优势和政策优惠，通过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集聚大量国外高级生产要素，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和出口能力，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黎峰，2016）。

自 2008 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出现“逆全球化”的趋势。世界贸易总量大幅减少，贸易增速已低于经济增速。2015 年世界贸易总量出现自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大幅下滑，降幅达 14%，远低于世界经济增速（3.1%）。从世界贸易总量的构成来看，作为全球价值链重要指标的中间品贸易大幅缩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 2015 年贸易总量的下降。根据我们的测算（Wang et al., 2017），2011—2015 年期间，全球价值链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普遍下降。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放缓，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一方面，发达国家推行“工业 4.0”和“制造业回流”等一系列措施，通过掌控关键技术环节和贸易投资新规则的话语权，力争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布局，促进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节点的回流。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的跨境次数减少，生产链国内部分占比提升，本国生产分工的深化在一定程度

上替代了进口中间品。

在全球价值链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大幅度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这意味着劳动力和资源环境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原有的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难以持续，我国原有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节点的加工产业正在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分流。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中高端节点向发达国家回流和中低端节点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分流的双重压力将我国产业沿全球价值链升级问题提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推动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2016年，在二十国集团（G20）工商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推动构建和优化全球价值链，扩大各方参与，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2016年12月，商务部等7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加快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给我国企业和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也为我国学术研究全球价值链重塑和产业升级提供了丰富的课题。

全球价值链重塑的现实背景和我国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在全球价值链发展与就业、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产业与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评估、效率与公平及全球化治理等诸多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重大领域提出了一批关键性科学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包括：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模式演化和理论重构（全球价值链重塑形势下全球价值链运行机制和组织模式，以及测度方法和演化规律的归纳）；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系统测度和内在驱动因素研究（全球价值链与经济增长、生产率提升等国家发展指标的关系研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变迁及其内在因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对全球价值链重塑的促进机制（企业层面、产业层面以及制度层面创新对价值链升级的促进机制）；全球价值链下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升级的互联机制；从由此建立的系统的全球价值链角度研究中国产业升级的理论内涵、升级路径和政策设计。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理论问题是全球价值链领域的前沿问题，在国际学界尚没有满意的研究成果。对这一系列科学问题的系统深入研究，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和升华出具有普适意义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方法，不仅对我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全球价值链战略布局，以及政府“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家产业政策设计有着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将促使全球价值链

研究融合供应链及物流管理、价值链的统计测度、价值链中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价值链治理、价值链与经济发展等多个领域,成为既有微观个案基础,又有宏观理论模型及完备定量分析工具和数据库支撑的完整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体系,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全球价值链概述

全球价值链研究是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和热点领域。自198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由于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大幅度降低通信成本,原先必须在近距离协调的生产各阶段能够分散到不同的地理空间进行。另一方面,鉴于垂直一体化管理(Vertical Integration)有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并克服不完全契约有关的交易风险,跨国公司在离岸外包和外商直接投资两种方式上做选择来组织国际生产网络。信息技术革新和垂直一体化管理的涌现为全球价值链研究提供现实基础。

价值链的概念最初是在管理学和社会学领域提出,最早Porter(1985)指出价值链是单个企业统一组织和协调自身的各项生产和经营活动以提高该企业整体竞争力。他的价值链概念主要涉及单个企业如何实现自身竞争优势,区别于全球价值链概念上的、为优化整个跨国生产网络而产生的多个企业协调活动。其后,Gereffi和Korzeniewicz(1994)提出了“全球商品链”(GCC)的概念,链上的参与者从国内扩展至全球范围,并从“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的角度,分析了领导企业如全球采购商或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商品链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为了摆脱“商品”一词的局限,并突出价值在生产网络中的创造和传递,Gereffi等(2005)采用了“全球价值链”(GVC)的术语,考察国际生产网络的治理结构与网络内企业之间价值分布,并根据客户企业和供应商之间议价能力从对等到不对等,以及客户企业介入供应商生产经营活动的程度由浅入深,将治理结构分为5类: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俘获型、科层型(见图1)。治理结构之间的动态转化,可从价值链的复杂度、可编码度和供应方能力三个方面进行考察(3 C's Model)。

随着全球化生产和研究中间品贸易的兴起,全球价值链研究也逐渐被国

上如何作决策来组织全球生产。Antràs 和 Helpman (2004) 进一步引入并分析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对企业全球生产决策的影响。Inomata (2014) 绘制了企业组织价值链的 4 种模式 (见图 2)。Antràs 和 Chor (2013) 构造序贯生产过程中企业行为模型, 分析企业根据每个生产阶段处于价值链的位置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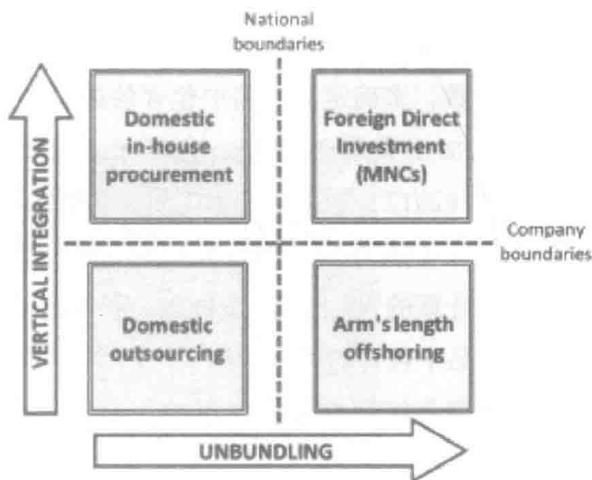


图 2 企业组织价值链的 4 种模式

做出生产或对外购买的决策: 当某生产阶段的投入品是序贯互补时, 领导企业选择外包相对上游的生产阶段并垂直集成相对下游的生产阶段; 当某生产阶段的投入品是序贯替代时, 领导企业选择集成相对上游的生产阶段并外包相对下游的生产阶段 (见图 3)。此外, Yi (2003) 和 Yi (2010) 等研究也在传统贸易模型中引入了序贯生产机制, 证明中间投入品在国家间的往返, 既会放大关税降低的效果, 也会带来贸易成本沿价值链叠加的“放大效应”。

Sequential choices of a value chains organiz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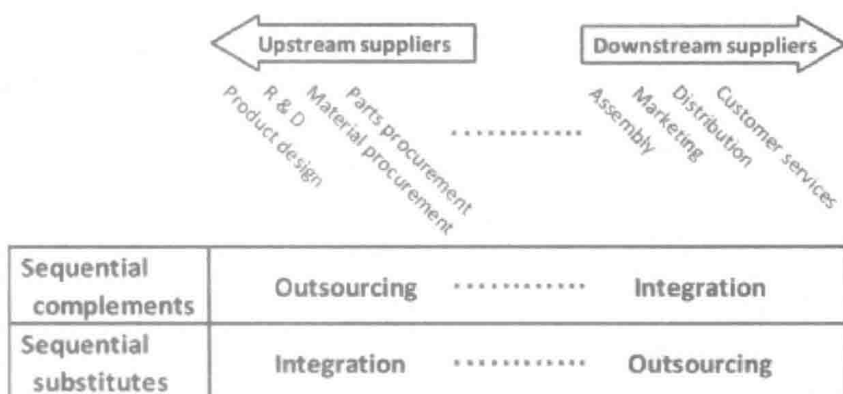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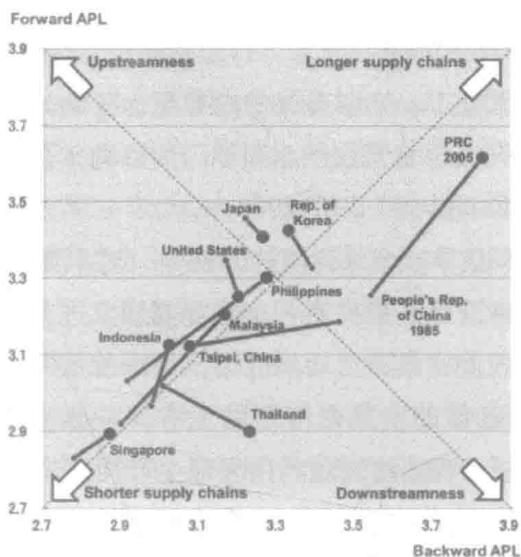
图 3 价值链上企业的生产和外包决策

全新贸易统计方法的出现，为全球价值链前沿理论的定量检验创造了必要条件。对于一国垂直分工参与度的度量，Hummels 等（2001）提出了 VS 指数和 VS1 指数，来确定出口品中包含的进口中间品的价值。Chen 等（2004）指出，忽视加工贸易的存在，会带来双边贸易平衡统计上的严重误差。Koopman 等（2012）根据考虑加工贸易扩展的投入产出表估算出中国人世前后（2002 年）制造业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比例是 50%，远大于使用标准投入产出表所计算的 VS 比例。Johnson 和 Noguera（2012）提出了 VAX 指数，来确定出口品中包含的满足外国需求的本国增加值占总出口的比重，并发现相对于传统贸易核算方法，使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时，中美贸易赤字下降了 30%~40%。

Koopman 等（2014）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可对各国贸易总出口进行全面分解的框架（简称 KWW 分解方法），在国际贸易核算与国民收入核算的标准间实现了统一，而且 VS、VS1 和 VAX 等指数作为该方法的特例，均可表达为 KWW 分解公式的某种线性组合。Wang 等（2013）进一步将 KWW 分解方法由国家层面扩展至部门、双边贸易、双边贸易一部门层面（简称 WWZ 分解方法），对全球价值链上的附加值生产结构和流动路径进行完整考察。而 Antràs 等（2012）和 Antràs 和 Chor（2013）则提出了价值链上的行业“上游度”和“下游度”等测算指标。Wang 等（2017a, 2017b）在 KWW 和 WWZ 的贸易流分解的基础上，构建了增加值和最终品分解框架，并据此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长度、跨境次数等量化指标的测度方法（简称 WWYZ 方法），为价值链结构的定量分析奠定了基础。

生产从一个国家扩大到多个国家时，原来的一国生产包含的分工阶段数量很可能随着可选择的生产技术变化和使用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而改变。而传统投入产出方法主要分析产业分工之间的联系，忽视了分工的长度。对此，Dietzenbacher 等（2005, 2007）构建了平均传送长度（APL），来确定生产网络中平均每个分支上包含的生产阶段的数量。Fally（2011）和 Antràs 等（2012）使用美国投入产出表，根据生产链上某产品/行业与最终消费品的距离衡量其对应的生产阶段的数量。De Backer 和 Miroudot（2012）将该方法运用在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投入产出表上。Inomata（2008）和 Escaith、Inomata（2013）使用亚洲跨国投入产出表确定亚洲区域供应链上每个国家的

相对位置，并发现中国处于区域价值链的最下游，与中国作为区域产品的最终装配者的角色相吻合（见图4）。



来源：Escaith and Inomata (2013)。

图4 东亚区域价值链上各国的相对位置

与大多数研究使用行业层面投入产出数据不同，Kee 和 Tang (2016) 使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即中国企业数据和海关的交易数据估计中国出口中国内增加值的比重，发现中国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改革使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提高，降低了多种国内原材料的价格，使加工贸易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用国内原材料替代了进口原材料，进而导致 2000—2007 年期间中国国内增加值占出口的比例从 65% 升至 70%。

二、全球价值链与产业升级

在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提出之前，产业升级的研究主要是在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和结构经济学等领域进行的，研究关注的产业升级方式主要是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或者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发达国家，需要依靠“创造性破坏”（新技术和新发明等）来实现产业升级（Aghion and Howitt, 1992）；

对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前提是要素禀赋的变化，即资本和劳动的比率从较低水平提升到较高水平（Lin, 2002; Ju et al., 2009）。在传统贸易领域，发展中国家一般通过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来推动本国工业化发展和产业升级（Low, 2013）。

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产业升级的内容更为复杂，从传统意义上的不同产业和部门之间的升级转变为在产业和部门内部的工艺、产品、功能或价值链等方面的升级（Gereffi and Lee, 2016）。

Gereffi（1994）最早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对东亚纺织链的产业升级进行了讨论，认为产业升级是指提高一个企业或国家进入获利更多，或者技术上更先进的资本及技能密集型活动的的能力，全球价值链上的主导企业通过对价值链的治理，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产业集群实现阶梯式的升级。Gereffi（1999）分析了香港纺织业利用全球生产网络实现升级的路径“OEM（代工制造）—ODM（代工设计）—OBM（自有品牌设计）”。

Humphrey and Schmitz（2002）首次对全球价值链框架下的产业升级内涵进行了划分和阐述：①工艺升级（process upgrading），通过改造生产流程或采用新技术来提高投入产出转化效率；②产品升级（product upgrading），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种类；③功能升级（functional upgrading），改变自身在价值链上的位置，提高技术和知识含量；④价值链升级（inter-sector upgrading），从现在所处的价值链跨越到新的相关的价值链，如台湾的电子产品制造商，利用最初获得的电视生产技术，跨越到利润更高的价值链，为跨国公司生产笔记本电脑和视频仪器等。

Gereffi 等（2005）认为，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影响产业升级的可能性。例如，全球价值链上，领导企业把策略性创新活动保留在企业内部，而把非策略性创新活动扩散出去（Pietrobelli and Rabellotti, 2011; Schmitz, 2007; Schmitz and Strambach, 2009）。Brancati 等（2016）发现，在 2008—2013 年期间，在意大利的中小企业中，只有关系型价值链上的供应商会参与创新，增加研发投入，并能抵御住金融危机对企业生产率和销售的冲击。但是，治理模式的影响并不是独立的，质量公约和标准、当地的制度和当地的生产网络会和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产生交互作用，最终影响当地产业升级的机会（Ponte and Gibbon, 2005; Palpacuer, 2008）。

传统的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文献，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其离岸子公司的技术扩散效应，而且随着投资不断深化，其认知和观点经历了如下转变过程：跨国公司只向离岸子公司转移创新成果，不转移创新活动本身（Lall, 1993）；在离岸子公司当地进行轻微的产品和过程改良，虽有创新活动但投入很少（Amsden et al., 2001；Coe and Bunnell, 2003；Narula and Zanfei, 2003）；大幅增加了在离岸子公司当地的研发活动，扩展研发范围，进行全球研发活动的重新布局（Wang et al., 2012；Reddy, 2011；Doz and Wilson, 2012）。这些文献只讨论了跨国公司与其子公司之间的创新活动联系。而在全价值链的框架下，价值链上的所有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子公司、当地供应商）之间都可能会发生技术转移。

Piermartini 和 Rubinova（2014）发现，通过全球价值链而联系在一起的国家间技术转移程度更高。WTO（2008）也指出，参与全球价值链促进了技术和知识转移。全球价值链衍生出了全球创新网络（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不仅企业在网络上布局，也涉及与参与创新知识生产的非企业组织之间的复杂交互（Barnard and Chaminade, 2011）。Parrilli 等（2012）提供了一个非线性的方法来分析全球创新网络的再组织对当地企业和生产系统的影响。Lema 等（2015）提出“对创新过程的筹划做拆解（ODIP）”这个概念框架，分析跨国公司、子公司、当地供应商之间的创新活动分布。

Deng（2016）通过对专利数据、贸易数据和投入产出数据的整合，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上的管理和技术知识的流动和传播对行业生产率及专业分工模式的影响，他发现，企业可以通过4个渠道的知识流动进行技术升级：与同行业的国内生产者 and 国外卖家接触，与跨行业的国内生产者 and 国外卖家接触。通过对全球知识传播的渠道进行分解，他发现，跨国和跨行业渠道对知识传播起主要作用。1990—2010年，跨国知识传播贡献了全球生产率增长的三分之二，远大于国内知识传播的贡献。同样地，全部知识传播的60%是通过跨行业，而非行业内知识传播进行的。特别是在非OECD国家（主要为发展中国家），从知识的自给自足到对知识传播的开放，获得的动态贸易收益达到实质GDP的12%，是OECD国家的2倍。

全球价值链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实现技术进步并最终实现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提供了契机。Humphrey 和 Schmitz（2000, 2002，

2003) 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目的, 其中, 生产能力的提升是一项主要考虑。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中间品包含了更多的技术含量 (Keller, 2000; Amiti and Konings, 2007)。价值链中的技术溢出效应, 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质量, 并且这种溢出效应在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中表现更为显著 (Blalock and Gertler, 2008; Acharya and Keller, 2009; Harding and Javorcik, 2012)。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学习, 可以提高技术水平, 进而实现产业升级 (Pietrobelli and Rabellotti, 2010; Kawakami and Sturgeon, 2012)。学习的环节, 不仅在制造过程, 而且可以延伸至品牌设计 (Navas-Aleman, 2011)。不过, 最终效果与当地的制度、政策和环境有关。例如, Wei 等 (2017) 利用中国企业的专利数据, 发现中国创新资源配置 (政府补贴) 存在明显错配和扭曲, 在创新领域,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及外资企业的竞争地位不平等。另外, 知识产权保护和教育体制也需要进一步改革。此外, 他们还指出, 在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下, 中国必须向依靠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Zhang 和 Gallagher (2016) 分析了中国光伏产业的升级过程, 认为中国能够从全球光伏产业链 (创新链) 中吸收更清洁的能源利用技术, 与全球化市场培育政策、人才的国际流动、国内制造业的灵活反应以及政府政策干预密切相关。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也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结构。从这一点来看, 全球价值链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Hanson 等 (2013) 指出,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过去二十年改变了其贸易结构。例如, 中国在二十年前, 前两大出口产品是服装和纺织产品, 而现在则是附加值更高的办公设备和电子仪器。Bambe 和 Gereffi (2013) 发现, 在过去十年中, 哥斯达黎加出口的医疗器械产品从简单产品转变为复杂产品, 实现了产品种类多元化和复杂化。

另外, 全球价值链也在推进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这种能力建设既提升了企业生产率 (Blalock and Gertler, 2008), 也获得了正向口碑效应, 有利于企业成为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Sutton, 2012)。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价值链的发展趋势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有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 3 方面: 第一, 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形式更为合理, 价值链上领先企业的控制力减弱, 不仅大型企业参与价值链分工, 中小企业也逐步融入进来 (Gereffi, 2014)。第二, 全球价值链的地理分布逐渐固化, 主要集中

在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中国、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等，其背后原因是这些国家不仅有充足的劳动力和大量制造业企业，也有广阔的本土消费市场（Gereffi and Sturgeon, 2013）。这促使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复兴，推动产业升级。第三，在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南北贸易”规模缩小，“南南贸易”增长较快。这有助于推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但是链条的很大一部分处于发展中国家会使企业的利润空间较小、引发激烈竞争（Kaplinsky et al., 2011）。

三、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

一些研究测算了中国出口品的技术含量，借以反映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例如，谢锐、赖明勇和李董辉等（2013）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测算了东亚国家的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发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不断上升。姚洋和张晔（2008）对全国、广东和江西进行了分析，发现全国和江西的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迅速下降，而广东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则呈 V 字形变化，并由此推断中国出口品技术含量下降是暂时的现象。姚洋和章林峰（2008）认为，在跨国分工加剧和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中国本土企业并没有在全球价值链上成为受害者，其竞争优势在逐渐上升，保持了出口技术水平的增长和对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追赶。唐宜红和林发勤（2009a）发现出口不仅仅依赖于丰裕的劳动禀赋，出口结构也在不断升级。

一些研究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的“锁定效应”。例如，刘志彪（2007）指出：中国对外贸易量的持续增长，并不必然会促进中国本土产业的升级；中国产业升级的机遇，一方面由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系决定，另一方面由其自身的战略和创新能力决定，在俘获型全球价值链关系中，中国企业的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能力增强，但是功能升级受到阻碍，特别是设计、品牌和营销等功能扩展受阻。张杰和刘志彪（2007）从需求控制能力的视角，分析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俘获型“结构封锁”关系。陈爱贞和刘志彪（2011）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发现确实存在低端锁定效应，而且以外资为主力的“为出口而进口”的贸易

模式增强了这种锁定效应。

一些研究分析了贸易自由化、FDI 与企业生产率提高的关系。例如，赖明勇和包群（2003）发现，一国技术变化一般不是来自本国的自主研发，而是国外技术转移和扩散的结果，FDI 是国际技术转移的重要渠道。赖明勇等（2005）构建了一个中间产品种类扩张型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发现本国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但贸易开放度、本国与外国的技术水平差距对稳态增长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他们认为，在引进技术时，并非总是需要引进处于生产前沿的高端技术，对于发展中国家，应该引进最能发挥本国生产潜力、与本国当前生产能力及技术吸收能力相匹配的技术。王华、祝树金和赖明勇（2012）证实，FDI 技术外溢是非线性的，存在技术差距的门槛值，FDI 对落在不同技术差距范围内的内资企业，具有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徐毅和张二震（2008）运用投入产出表分别对中国 35 个工业行业 1997 年和 2002 年的国际外包率水平进行了测算，并实证分析了国际外包对中国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企业外包会有效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扩大企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但对劳动力市场没有显著影响。余森杰（2010）利用 1998—2002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余森杰（2011）利用 2000—2006 年中国外贸产品的海关数据和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发现，企业参加加工贸易，可以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余森杰和李晋（2015）发现，中间品进口和最终品进口都对企业生产率有促进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同质性行业，由进口竞争效应引发。余森杰和李乐融（2016）发现，相对于加工贸易，贸易自由化显著提升了一般贸易中的进口中间品质量。



第一章 世界经济的新特征：全球价值链	001
第一节 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基础	001
第二节 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演化	004
第三节 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类型	009
第四节 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内容	012
第五节 全球价值链的核算方法	020
第六节 全球价值链的实证挑战	024
第七节 全球价值链研究发展与展望	036
第八节 全球价值链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引擎作用	038
第二章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特征	046
第一节 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决定因素	046
第二节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特征	053
第三节 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间的生产关联	057
第三章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升级	059
第一节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的位置提升	059
第二节 中国出口增加值核算及变化分析	068
第三节 全球价值链重塑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092
第四节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中国全球价值链攀升	095

第四章 全球分工中的中国力量	115
第一节 中国与东亚价值链的重心转移	115
第二节 中国在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贡献	120
第三节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价值获取程度	124
第四节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与演进	138
第五节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国际分工地位的考察	149
第六节 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的国际比较 ..	177
第七节 OFDI 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	274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减速对经济的冲击	291
第六章 “一带一路”与绿色价值链	314
第一节 打造绿色价值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314
第二节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发展新趋势中的位置与作用——“双环流” 体系	319
第三节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打造绿色价值链的主要任务与挑 战	323
第四节 “一带一路”发展中中国打造绿色全球价值链“双环流”的政 策建议	328
参考文献	336